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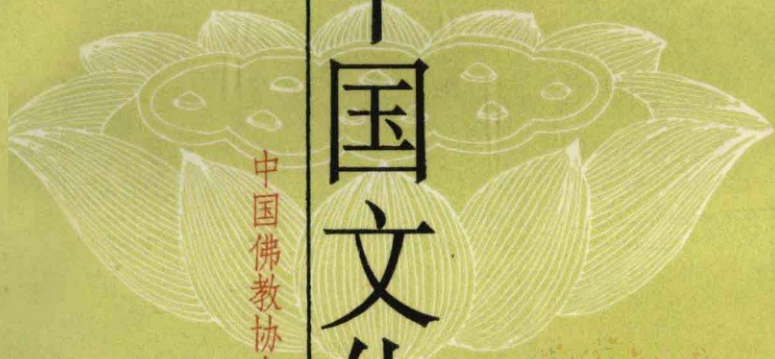


净慧 主编

《法音》文库

佛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净慧 主编

《法音》文库

佛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目 录

- 佛教和中国文化.....赵朴初 (1)
- 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赵朴初 (7)
- 简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历程.....罗 颖 (11)
- 佛典文献叙录.....苏晋仁 (21)
- 从语言学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李明权 (27)
- 佛教词语小议.....俞 敏 (39)
- 佛藏朔源.....孙宗文 (45)
- 浅谈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陈绮绮 (51)
- 中国佛教美术的来源及其概况.....常任侠 (56)
- 佛教与中国绘画.....潘天寿 (62)
- 佛教与书法.....熊秉明 (69)
- 略论佛教与中国书画之因缘.....郭元兴 (78)
- 汉唐佛教音乐述略.....王小盾 (86)
- 中国佛教音乐的形成与发展.....明 青 (107)

佛法与现代医学	陈重晖 (114)
论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	潘猛补 (122)
法鼓轶闻	孙宗文 (135)
寺钟琐语	孙宗文 (143)

佛教和中国文化*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一、佛教的传入中国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

*此文系一九八四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第十四届大会时向大会举办的佛教学术座谈会提交的学术论文。

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特点

中国佛教具有下述特点：

(一) **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二) **丰富性**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1）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但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般。至于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了。（2）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

“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三) 广延性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藏语系佛教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在教义上保持印度原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长，创造了极为光彩夺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语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统，在傣族各地区形成傣族文化的主体。

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这一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进行深入的研究。大体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一) 学术化 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

想学说来接受，钻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如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提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余卷大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

（二）艺术化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工艺、纺织、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这一方面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公元三〇一年前后来华的耆域大沙门看见洛阳寺、塔、宫殿的壮丽，赞叹说，“兜率天宫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阳永宁寺建成后，菩提达摩祖师见之，“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赞叹说，“此寺精丽，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见修梵寺的金刚像，形像逼真，赞美说，“得其真相。”至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造像、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札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

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

(三) 社会化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如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学家、医师、史学家、文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的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举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蕃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3），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这一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无法分割了。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

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面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一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赵朴初）

要研究佛教对中国 文化的影响

——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

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

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赵朴初)

简述佛教与中国文化 相结合的历程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已很难考定。史学界一般以汉明帝求法故事为佛教入华的标志。史载，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翌日晨，帝问梦于朝中大臣，太史傅毅答道，你梦见的是位神，名叫佛。佛有非常的神通，是西方的得道者。于是，明帝派遣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永平十年，纪元67年），蔡愔等从西域请来了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还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特为之建白马寺。摩腾、法兰在白马寺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佛教开始在汉地流行。这个故事虽有可推敲处，但明帝时佛教已传入中国却不容怀疑。如《后汉书》记载，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可见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已不乏信奉佛教者，至于民间与佛教的接触，可能还要早于明帝时代。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它要在中国生存、发展，首要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佛教如何与我国固有文化相适应、相协调。从两汉佛教传入，到隋唐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再至宋明时期佛教最终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这个历程，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一、传入期（西汉——东晋）这一期以翻译佛经、介绍佛教为主；至于对佛学义理的阐述，虽有不少，但大都是不得要领、有所偏颇的。大致而言，当时佛学界的基本水平仅停留在对佛教

名相的释义上，而这项工作也多用臆测、比附的方法进行之。

这个时期，由于佛教还没有具备足以独立的条件，所以必须依附时代文化的主流求得生存。先是佛教依附于汉代流行的道术（神仙方术），借此得以流传；到魏晋时，佛教又倚傍于玄学而盛行。上面提及的楚王英同时信奉黄老和浮屠（佛），后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说明时人视佛教与道教为一事。而佛教徒也不自执著，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往往自称为“道人”，把佛教说成是道术的一种。如牟子《理惑论》说：“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佛教无非被视为一种较高的道术罢了。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分为二大系。一为安世高系，此系重禅法，这个禅与隋唐时禅宗兴起后所讲的“禅”有所不同，而是一种与道教的呼吸吐纳术十分相近的修习法，其所追求的旨趣乃是“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扞；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一种神通广大的特异功能。安本人在当时就被目为通晓“七曜五行，医方异术”，具有神奇能力的神僧，而受到不少人的崇拜，禅法的传习也比较普遍。当代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史学者柳田圣山在其名著《中国禅思想史》一书中指出，中国民族对神异奇迹的兴趣，“由后汉末年开，至魏晋南北朝时代而达到最高潮”，而“佛教是外国的宗教，它的传入，与此大有关系”。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神异奇迹的历史背景下，佛教适应了这个时代民族心理的要求，应运而起。另一是支娄迦讖系，支讖主要是介绍佛教般若学的理论。般若学主要阐述大乘缘起性空的思想，这种理论与道家的一些基本思想颇为相似。当时的一些僧人往往也喜把般若学说成是一种能使人“返真”而与“道”相合的学问，支讖在他的译经里也把“波罗蜜多”译作“道行”，“如性”译为“本无”。通过借用道家思想，般若学理论很快地传播开了。另外，当时的学僧喜用道家名词去附会佛教概念，如把“涅槃”释为“无为”，也足见佛教对中国原有文

化的迎合。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佛学又与玄学合流。不少僧人通过引玄入佛、以玄释佛的方法来扩大佛教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类兼有名僧与名士双重身份的义学僧人，他们时而引经论典，时而谈玄说妙，常常援用玄学思想来阐发佛家理论，以提高世人对佛学的兴趣。这些僧人不但于佛学、世学的修养、见识上有独到之处，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名僧支道林论说《庄子·逍遥篇》，能“卓然标新理于二家(郭象、向秀)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高僧传·支遁传》说支注《逍遥篇》，使“群儒旧学莫不叹伏”。且他们的德操风范往往也超人一筹，如东晋名士习凿齿曾向当时的政治领袖谢安致书，推荐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说他的道德学问“远胜非常道士”；东晋孝武帝非常敬重道安，他也遣使下诏，向安公问候致意：“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史载，安公门下，常常聚有成百上千的徒众。其中有不少人不辞千里前往求学问道，甚至有仅为礼拜瞻仰安公之风度而来者。所谓道由人弘，时人不乏从对高僧的倾服进而敬信佛教的。这个时代，佛教已开始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了。东晋初，般若学大盛，产生了所谓“六家七宗”般若空宗学派。这些学派，一方面资取玄学思想来阐述般若学“空有”关系的理论，以加速佛学的流传。另一方面又努力探寻佛学的精义，以求得佛教的独立。近人汤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般若学“所以盛之故，则在当时以《老》、《庄》、《般若》并谈。”般若学有关“空有”关系的理论与玄学的“本末”之辩，都是一种形上学的理论，两者在思维方式上也比较接近，故很容易衔接起来。而般若学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比之玄学，更为精致，所以更适合该时代喜究玄远之风尚。当时的学人即有从服膺老、庄转而研习般若学的。如《高僧传》记载，一代佛学大师僧肇，“志好玄微，每以